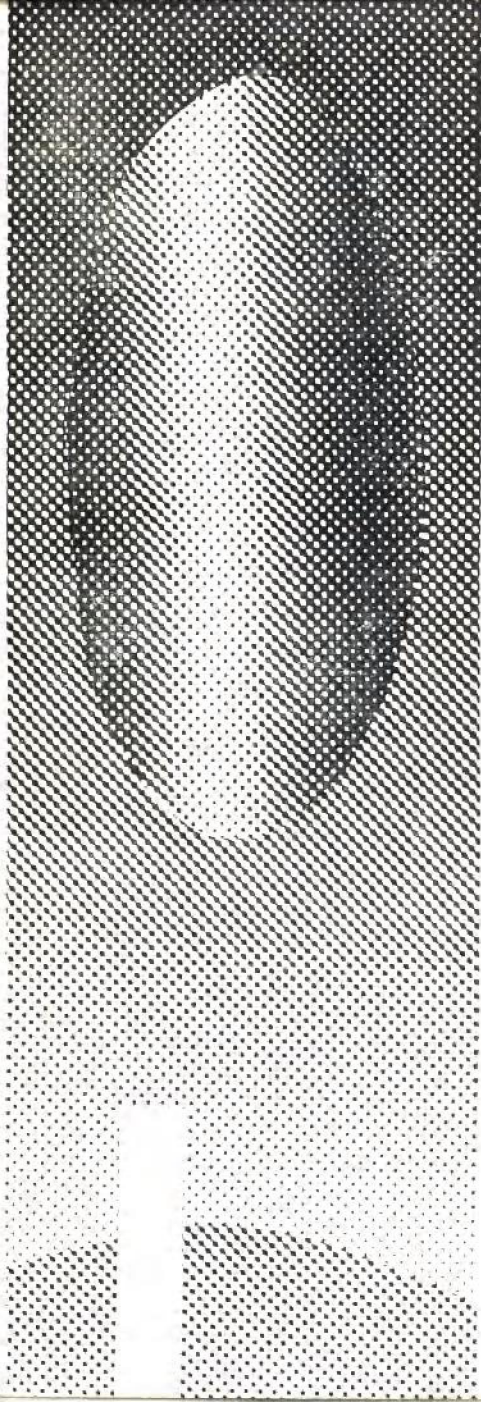




马克思·韦伯



马克斯·韦伯

〔英〕弗兰克·帕金著
刘东 谢维和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成都

责任编辑：何昌宇
特约审稿：王 焱
封面设计：戴士和
插 图：戴士和
装 帧：盛寄萍



马 克 斯 · 韦 伯

刘 东 谢维和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6.5 插页5 字数100千

1987年6月第一版 1987年6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0017-0/c·9

统一书号：17118·176 印数：1—96,000

定价：1.25元

编者献辞

1955/20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面貌；反映人类认识和追求真理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逐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所

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更迭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5页。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原编者序言

马克斯·韦伯，就象几乎和他完全同时的埃米尔·杜克海姆（1858——1917）一样，在任何一套专讲《重要社会学家》的丛书之中，都应占有一席之地。的确，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他的名字总是跟杜克海姆和卡尔·马克思结合在一起，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的神明，而不管这种三位一体的表面伙伴关系在更仔细的考察中会显得多么貌合神离。马克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家——他一生中的标记很难被说成是叙述了任何一门被认可的学科。这并未妨碍我们把他描写成一位重要社会学家——这套丛书的另外一本确实是专来讨论《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是因为他所撰写的正是现代职业社会学家所注视的焦点。杜克海姆同样也与韦伯没有多少相通之处。尽管都是学院式的社会学家，但两人独特的理论和方法却使他们彼此间

差距很大。即使是他们对于发展新兴的社会学科学的思想，也是迥然不同的，杜克海姆倾毕生精力于创立教育机构的韧性工作，把团体和期刊看作制度化的根本手段，而韦伯则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满足于抓住根本的问题，并时常提出一个对别人有益的鼓舞人心的思想。也许，最典型的是：只要他可以那样做，他更喜爱那种经常作为他讲演场所的私人沙龙的小圈子。因为在他中年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精神上的毛病使他丧失了教学的能力。

但韦伯和杜克海姆却在某些地方相似。他们都关切着一个学科的发展，这个学科照马克思看来，说得好听些，是一门具有高度党派性的社会“科学”，说得难听些，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当他们着手这项工作时，社会学这门学科在欧洲并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情况在美国略有不同）。当德国大学于十九世纪后期在其他方面长足进展的时候，它却只有一个脆弱的立足点——韦伯直到他一生的最后才从经济学转了过来，在大学里获得了作为一位社会学家的位置。杜克海姆在法国的遭遇也与此相似，就象韦伯一样，他是从哲学和教育学转到社会学来的，这些事实足以为证。

那么，为什么韦伯是一位“重要社会学家”？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可以在弗兰克·帕金的书中

找到，而我不想在这里预先说明。但无论如何，仍有必要进行几点一般性的说明。韦伯正象马克思和杜克海姆一样，对于那些一直是这门学科发展之关键的思想的创立，是有贡献的。诸如“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想型”、“统治形式”和“社会的分层过程”这样一些概念，都已被社会学家们利用并修正去研究广泛的问题。这些观点起初是在社会学的理智疆界被大大限制的时候被表述出来的，而它们在它成为国际性科学的道路上，通过这门成长中的学科的种种变迁，已经因盛行不衰而显示出其力量。不过，韦伯的思想决不是对马克思和杜克海姆思想的简单补充；他们拥有各自的读者，抱着不同的目标。这便说明，为什么无论怎样努力综合他们的理论，他们仍从根本上是对立的——他们对复杂社会的理解模式有所不同。韦伯的社会学诸模式不同于那种三位一体中的另外两位伙伴：这种模式反对马克思和杜克海姆关于社会集体的思想，强调一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坚信个人见解的价值，而且并不认为总是必然能够取得对社会学问题的无可更改的答案。

无庸置辩的是，韦伯的著作已经对西方社会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指出，它也包含着似是而非和矛盾，这已招致了对他的概念和

方法的种种不同解释。韦伯将不会为此而惊讶。情况一直是这样：这位被认为是这种或那种重要公式或类型之源头的“韦伯”，其实是一个可以被以许多不同方法去读的变化多端的人物。

因此，弗兰克·帕金的研究，其重大的功绩便在于，它集中了韦伯学说中的四个已经被社会学家们反复讨论和大量利用的主要成份。他依次考察了韦伯作为方法或理论而提出的东西，然后提出了一种既能说明其社会学的力量，又能说明它的矛盾的批评。也许，韦伯对社会学的重要性正是在其矛盾中。因为通过批评性地审视他的论点，我们可以继续前行，去发展那些超越过韦伯的社会学观念。只有通过揭示前人的错误，一门科学方能进步。弗兰克·帕金的书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韦伯能在社会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为什么他的思想是通向有关社会的更深刻见解的跳板。

彼得·汉密尔顿

作者序言

本书换一个角度来看韦伯的某些最为人熟知的对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贡献。书中的主要部分几乎完全没有涉及韦伯“其人”——他的生平、家事和政治活动，或者他那儿回偶发的精神错乱。对所有这些方面中的有意思的东西，我只提供了一个简短的生平概略。

我们考察的是韦伯著作中四个独立的部分。第一章分析他对于方法的介绍和见解。在这里，产生了许多问题：程序的运用和作为一种严格理解模式的应用，以及对理想型结构的行为的解释要求。同时，也要涉及韦伯有关道德中立和历史解释的观点。

第二章考察他对于社会行动之规范性（normative）和制度性（institutional）部分的说明，特别涉及了宗教信仰与行为。这里，对于韦伯试图确立早期新教信仰和理性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推理步骤，表示了某种怀疑。同时，这里也试图点明那种存在于他对加尔文教的分析和他那遍及其

一般宗教社会学中的更加“唯物主义者”立场之间的悖反。

第三章考察了他对权力关系和统治类型的讨论。这里，提出了一种想法：韦伯有意去混淆合法化与合法性之间的界限，而且他的统治社会学由于缺乏一种补充的依存理论而有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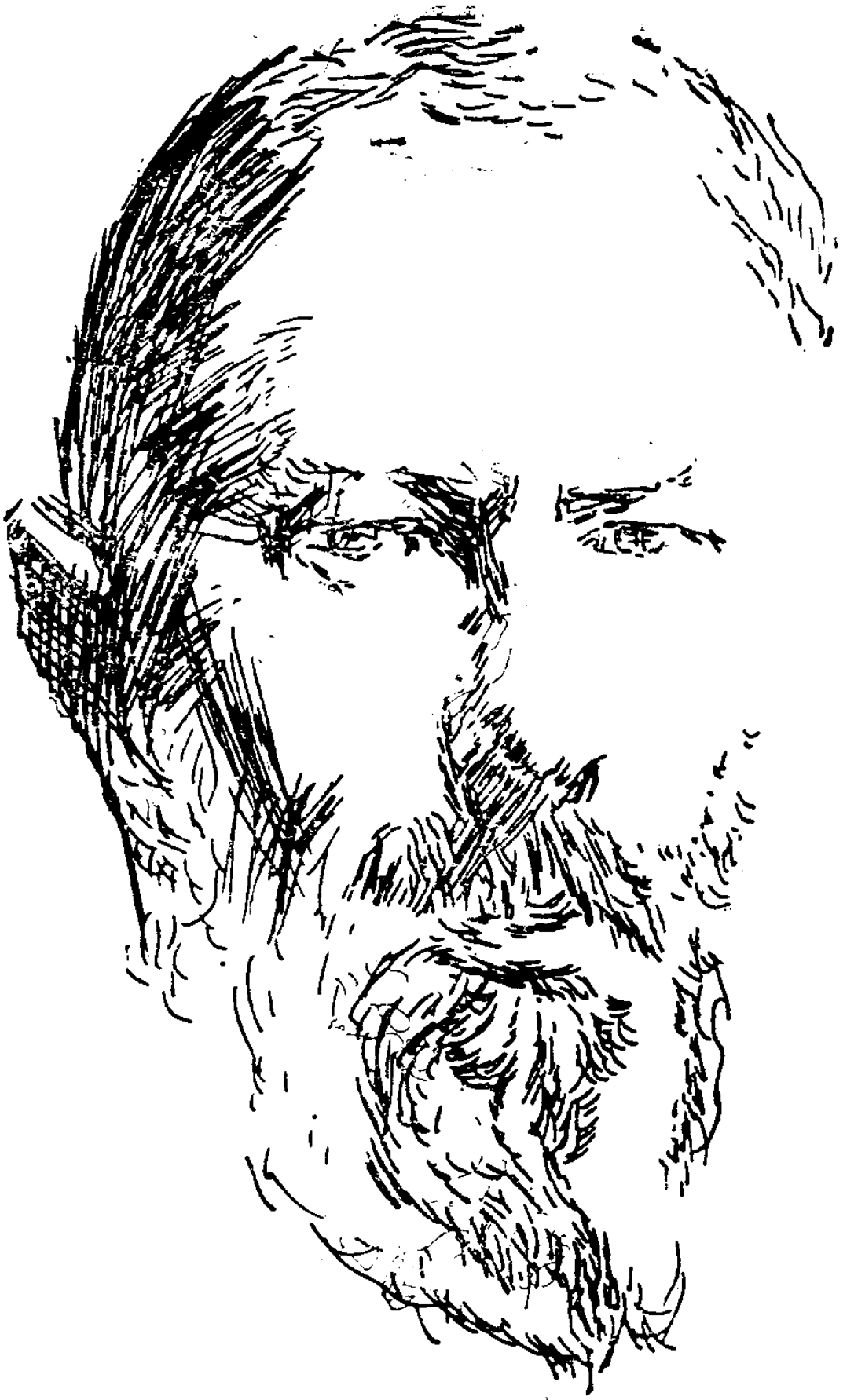
第四章论述的是他对于分层理论的贡献。这里，对韦伯和马克思有关阶级、财产关系和国家概念的分析，进行了对比；并特别注意了韦伯关于在分配机构中的地位一群体公式的思想。本书以评价韦伯的多少有点儿偏执的关于“政党”在权力全面分配的情况下的作用的估价而结束。

唐纳德·麦克利（Donald Mac Rae）说过，“所有针对韦伯的写作其实都出于敬畏。”我试图不让自己对韦伯成就的敬畏蜕化成为崇拜。书中提出的大多数论点都是在先后举办于牛津、伯克利和纽约大学的系列讲座和研讨班中首次发表的。上述学校的教师和研究生们经常对我思路中的失误进行成功的指点，对此，我谨表示由衷的谢意。

弗兰克·帕金

1981年9月于牛津麦克戴林

（Magdalen）学院



MAX
WEBER

生平概略

马克斯·韦伯，1864年降生于艾尔福特（Erfurt），那曾是汉撒的一个城镇，现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一部分。他生下来不久，他家便迁往柏林，在那里，他们的家成了当地学者、商人、艺术家和政治名流的谈话场所。年轻的韦伯，自然不能掩起耳朵不去倾听大量很有教养而且品格高尚的交谈，而这里边无疑包括少量富于启发性的政治见解。高中毕业以后，他就读于海德堡大学法律系。在那里，他似乎是加入了所有传统的少爷学生们的胡闹：学得少，喝得多，玩得多，并试图（成功地）在决斗场上把自己的脸划开。

服一年兵役以后，他恢复了学业，起初是在柏林，后来到了哥廷根。在那里，他用起功来。他于1889年完成了论及中世纪贸易交往的博士论文；再过两年，他又呈交了论述罗马地权史若干问题的大

学授课资格论文。这使他正式获得了谋取大学职位的资格，而他也就及时地在柏林就任法律讲师。两年以后，他搬往弗莱堡。1896年，又迁回海德堡。

麻烦事儿正是在海德堡开始的。在1898年，正当他的大学生涯刚刚开始结出果实的时候，他经受了一次精神崩溃，它打断了这种生涯。几年以后，他才能再恢复学术工作，而此后他的学院生活是作为一种延长了的休假度过的。他父亲死去以后，他的病又复发了。根据种种记载，老韦伯是维多利亚式家长的拙劣的摹本：他是子女的严峻的军纪官，对妻子也专横而麻木。他死前不久，曾和儿子马克斯有过激烈的争吵。儿子坚决要求母亲能被允许在没有父亲陪同的情况下来看望自己，因为这位父亲有点儿象小丑。这场口角因小韦伯不可思议地命令自己的父亲离开家庭而闹到顶点。此后韦伯再没有在父亲生前和他见上一面。在得悉老人暴卒的消息后，他受到了负疚和悔恨的折磨。此后，他实际上已变成了紧张症患者。韦伯和弗洛伊德从未见过面，但不难猜想，弗洛伊德准能确诊他的病症。

由于不能专心致志于任何事情，韦伯便以旅行来自慰。于是他开始总是打起行装去匆匆搭乘车船。他的目标主要是南欧，特别是意大利。但是在1904年，他离家更远，到美国去了一趟。他被大都

市生活的节奏和喧哗，以及土著人奇特的民主习惯所吸引。美国的很多东西都使他羡慕，在那里，他看不到高贵对粗俗的蔑视，而这却是在对欧洲知识界的访问中司空见惯的。

这片新大陆肯定使韦伯获益非浅，因为一回到家，他便重操旧业。他很快地完成了关于方法和关于新教伦理的论文。他自学俄语，并在数月之内，便有效地掌握了撰写一篇有关1905年革命的论文的最新材料。尽管他的忧郁症轻度发作，但只要一干起工作来，他那巨大的创造活力便泉涌不止。一连串的研究接踵而来，他论及了法律制度、宗教体系、政治组织和权力关系，无论从比较范围之广还是从文献资料之丰上，都迄未被超越过。这直到今天还叫人难以置信。韦伯挥洒自如地赋予了每一个不同学科以相应的发展，而没有哪个人能够有本事去横跨法律、历史和那些包含任何靠近他的综合把握之内容的诸门社会科学。

他广博的成果曾因1914年战争的爆发而一度中断。他其时已届五十，不能象年轻人一样参战，为此他深感懊恼。他只被任命负责他家乡医院的管理工作，这对于一个渴望着激烈行动的人来说，算不得一项太有魅力的任务。不过，要把韦伯描绘成为

佛洛伦萨·南丁格尔*的普鲁士化身是很困难的，尽管他似乎乐于扮演这个角色。过了一年左右，他为了到某个不引人注目的为研究关税问题而设立的政府委员会去任职而放弃了医院工作。这个委员会听起来并不比去为绷带和便盆的供应而操心更重要。在战争的最后两年，他干了更富有成果的行当，这件事他做得最好：论述社会而不是费力去管理它。他再一次把精力转向撰写论文，这些论文在他身后结集为《经济与社会》。

战争结束以后，他几乎是开始了一种政治生涯。他加入了新成立的德国民主党，并同意把自己的名字印上法兰克福选区的小小候选人名单。据他妻子玛丽安所说，韦伯深信自己能够被推举为党的候选人。他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而根本没有为谋求支持而烦神——或许是因为他认为结果已经铁定了，或许（这种可能性更大）是因为他不能太使自己屈就于党派政治的蝇营狗苟之中。不管怎么说，他没有得到提名；选举会议淘汰了他而垂青于一位当地的肖小。韦伯显然为此结局而震惊和深深沮丧。这位在理论层次上对权力的结构如此精明的人，一旦进入权力的实际时，便变得有些幼稚了。

* 佛洛伦萨·南丁格尔，1820—1910，英国护士，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是近代护理制度的创始人。——译者注